

伟大的牧神
世界生态文学的先驱



普里什文文集

主编：刘文飞

人参

[俄] 米·普里什文 著
何茂正 等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I512.15
P906



普里什文文集

主编：刘文飞

人 参

[俄]米·普里什文 著

何茂正等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参/(俄罗斯)米·普里什文著;刘文飞主编;何茂正等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2

ISBN 7-5354-3178-X

I. 人…

II. ①米…②刘…③何…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6503 号

策 划:刘硕良 吴 超

封面设计:大象设计工作室

责任编辑:丁立华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22.125 插页:4

版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40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总序 ·

普里什文:伟大的牧神

刘文飞

1908年,刚刚才发表自己最初两部作品的普里什文,引起了当时俄国一位著名批评家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Р. В. 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的注意,这位批评家在一篇题为《伟大的牧神(论米·普里什文的创作)》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米·普里什文是一位已经形成了的、完整的大艺术家……他有着自己的形式,自己的风格……有一个主题贯穿着他所有的作品,这一主题就是——伟大的牧神。他想解决一些世界性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与你生活其间的自然世界融为一体……他写下了自己的印象,摆在我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些民族学论文和旅行笔记;但这仅仅是画面的底色。全部的实质还在于作者面对‘自然’时的那些最亲密的感受。”^①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敏锐的批评目光,准确地捕捉到了普里什文创作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即其与自然的“最亲密的”联系。从此,“伟大的牧神”(Великий Пан)这一说法就不胫而走,成为对普里什文独特的创作风格最好的概括之一。在自己的作品里普里什文也说,他自己潜在的交谈对象就是“那些视我为伟大牧神的我亲爱的读者们”。(7;143)

“牧神”(Пан;Pan),又译“潘”,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森林和畜牧之神,他身

^①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创作和批评》,俄文版,普罗米修斯出版社,圣彼得堡,1911年,45—46页。转引自《普里什文八卷集》,俄文版,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卷,9页。以下自该书引文只在引文后的括号中注明卷次和页码。





体是人,腿脚为羊,头上有角。其实,他不仅是牧人之神,同时还是猎人、渔夫和养蜂人等的保护神,他爱好音乐,常吹奏起自己制作的排箫,带领山林仙女舞蹈嬉戏。这是一个大自然的化身,同时也是人、神和自然和谐统一的象征,是艺术与自然完美结合的象征。俄国作家普里什文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中远足大地,出入森林,亲近自然,长歌曼语,的确就像是20世纪俄国文学中一位“伟大的牧神”。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ишвин)于1873年1月23日(新历2月4日)生于奥廖尔省叶列茨县的赫鲁晓沃庄园(Хрущево)。米哈伊尔·普里什文的父亲出身商人家庭,拥有一座200俄亩的庄园,但父亲过的是一种“不安分的生活”(普里什文语),一生充满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养马,种花,打猎,酿酒,玩牌,无所不为,却又一事无成,后来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很早就去世了,把妻子和5个孩子留在贫困之中,当时,米哈伊尔·普里什文才7岁。米哈伊尔·普里什文的母亲是一个坚强、能干的女性,为了赎回自家的庄园、养活子女并为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她含辛茹苦,终日操劳。普里什文对母亲很有感情,在晚年的日记中还常常写到母亲,写到梦中与母亲的相见。普里什文的夫人后来在谈到双亲对普里什文的影响时写道:“如果说,未来的作家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幻想的热衷,那么,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则是对工作的责任感。”(1,9)作为一个旧礼仪教派信徒的母亲,其严谨、内敛的生活作风也影响到了普里什文,顺便提一句,普里什文在作品中对旧礼仪教派的一贯关注,也许与母亲的信仰不无关系。

1883年,10岁的普里什文被送进叶列茨中学。叶列茨城(Елец)位于莫斯科以南,地处俄罗斯腹地,这块自然风光和生活方式都为典型俄罗斯式的地区,也是俄国文学的乐土,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布宁、列斯科夫、费特、叶赛宁等的家乡都在这一区域,出生在沃罗涅日的布宁,甚至是普里什文在叶列茨中学的校友。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作家又几乎都是描写俄罗斯自然的大师。

在中学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对普里什文后来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884年,普里什文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逃离了家庭和学校,去寻找他们想象中的童话国度——亚洲的金山国。在《跟随魔力面包》中,置身在阿尔汉

格尔斯克白夜中的普里什文,又多次回忆起了自己年少时的那次出走:

无名之国,无疆之国!

这就是我们这些野孩子渴望逃往的地方。由于无知,我们时而称之为亚洲,时而称之为非洲,时而又称之为美洲。但那个地方没有边界,就始自透过教室的窗户可以看见的那片森林,我们逃向了那里。

长时间的游荡之后,我们被抓了回来,被当作森林中的小流浪汉给关了起来。大人们惩罚我们,嘲笑我们,竭力证明,并要我们相信,没有这样的国度。但在这古松环绕的石头墙边,在这野性的拉普兰,我无限悲哀地感觉到,大错特错的正是那些成年人。

少年们寻找的国度的确存在,只不过,那是一个无名之国,无疆之国。
(1;252)

这样的夜真让人难以入眠……实在睡不着……我回忆起我们小时候,把书包挂在公园里树丛里,划着一只小船顺河漂向那个未知的美丽国度。

这个国度怎么称呼来着?我竭力地回想。我们称之为美洲,有时又称之为亚洲,澳洲……这是一个无疆之国,无名之国,至今它仍被那些似乎应当被我们战胜的野蛮人所占据,被那些或善或恶的各类动物和长着绿色阔叶的各类植物所占据……(1;291—292)

后来,普里什文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反复复地提起这一事件,并认为这是他平生第一个追求理想的自发举动,而他后来毕生的创作其实也就是这次“出走”的延续。

1889年,四年级学生普里什文由于顶撞地理老师而被学校开除,而这位地理老师不是别人,就是后来成了俄国著名作家和哲学家的瓦西里·罗扎诺夫(Василий Розанов)。其实,罗扎诺夫原本非常赏识普里什文,在普里什文的上次出逃之后,他曾是学校里惟一为普里什文辩护的老师,可是在普里什文顶撞了他之后,他却又坚决主张开除普里什文。不过,普里什文却并不怎么记恨罗扎诺夫,他们后来甚至成了朋友,互赠书籍,还经常一同参加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主持的宗教哲学学会的活动。直到1922年,普里什文还在日记中写到,是罗扎诺夫在他身上“激发起了对人类秘密的神圣景仰”(2;651)。罗扎诺夫对宗教哲学的兴趣,对人与自然之间深刻关系的探究,甚至连罗扎诺夫独特的哲理抒情散文文体,都对普里什文产生了显见的影响。若干年之后,普里什文与罗扎诺夫在彼得堡见面时,罗扎诺夫拥抱了普里什文,并不无自嘲地说了一句:“普里什文,亲爱的,这样的结果对您也很有利啊!”



普里什文少时生活中相继发生的这两件事,既是普里什文独特性格之鲜明体现的结果,也是他日后命运变迁的重要起因,这两个事件可以使我们对普里什文产生这样两个深刻的印象:首先,外表安静内向的普里什文,却始终深怀着一颗渴求的、躁动的心灵,对童话般的未知远方的追寻,构成了他意识和现实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其次,将个性视为个人存在之前提的普里什文,同时又是一个宽容、善良的人。

被叶列茨中学开除之后,普里什文投奔了舅舅伊格纳托夫,舅舅是西伯利亚的大商人,在他的安排下,普里什文于1889年顺利进入秋明实科中学。1893年中学毕业后,普里什文进入里加综合技术学院化学系农学专业。在里加,普里什文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动笔翻译了德国革命家倍倍尔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妇女》。由于这些地下活动,普里什文于1897年被捕,在狱中呆了一年之后,又被流放到故乡叶列茨。

1900年,被剥夺了在俄罗斯继续就学权利的普里什文,获准前往德国。普里什文当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用他自己后来的话来说,是出于行动的渴望和变革现实的朦胧理想,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故乡德国的见闻却使他逐渐感觉到,变革社会的革命学说及其实践似乎并不符合他的社会和美学理想。与此同时,他却迷上了瓦格纳的音乐(据说他在留学德国的两年中曾37次观看瓦格纳的歌剧《汤豪舍》)和德国的自然哲学。但出于回国之后必须找份工作的实际考虑,他还是选择了一个实用专业,在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农学专业完成了学业。1902年,普里什文结束在德国的留学前往巴黎,在这里与巴黎大学的俄国女大学生伊兹马尔科娃(В. П. Измалкова)相恋,这场恋爱只持续了短短的两个星期,最后以分手告终。据普里什文后来在日记中说,其原因是“他觉得他爱的不是她,而是自己的幻想”,她觉得自己“只是他飞翔的理由”(лишь повод для его полета)。巴黎初恋的失败,给普里什文留下了难以忘却的隐痛和惆怅,对他后来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也多次在作品和日记中回顾这段既浪漫又伤心的往事。但是,这次失败的初恋却真的成了普里什文尔后“飞翔的理由”,强烈的内心体验,失去单一对象的爱的辐射和衍变,甚至是心灰意冷之后的专注和奋发,都构成普里什文一生文学“飞翔”的动力和前提。

在进叶列茨中学之前,普里什文还曾在赫鲁晓沃附近的一所乡村小学里读过书,在莱比锡大学留学期间,他还同时在柏林大学和耶拿大学听过课,再加上秋明实科中学和里加综合技术学院,普里什文的求学经历也算是非常丰富的了。他后来在《猎取幸福》(Охота за счастьем, 1926)一文中曾写到,他对

生活所持有的独特态度,“后来转化为一种叛逆行为,这种叛逆行为把我从一所学校抛到另一所学校,从一个国家抛到另一个国家”。也许,在普里什文经历过的“学校”中,还应该包括他少时逃向的“亚洲”和作为他情感炼狱的巴黎之恋。

回国以后,普里什文获得土地规划工程师证书,先后在图拉、克林和卢加等地担任农艺师,同时也在莫斯科的彼得罗夫农学院工作。在克林工作期间,普里什文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与一位乡村寡妇同居,这位乡村妇女名叫斯莫加列娃(Е. П. Смогалева),是个文盲,还带着一个孩子。1904年,普里什文全家迁居彼得堡,他先担任一位农业百科全书编辑的秘书,后在卢加农艺站工作。从这时起,普里什文开始写作并发表了一些专业论文和论著,如《怎样给大田和牧场施肥》(Как удобрять поля и луга, 1905)、《大田和菜园土豆栽培》(Картофель в полевой и огородной культуре, 1908)等。1905年,普里什文在《泉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小萨沙》(Сашок),这让他深受鼓舞,不久他就放弃了农艺,转向文字写作。从1905年起直到十月革命,普里什文担任了《俄国新闻》、《话语》、《俄国之晨》和《白昼》等多家报纸的记者,陆续发表了一些特写和报道。也就是说,普里什文虽然迟至30岁余时才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但他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创作准备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打过“文学短工”(поденщик литературы)的。

二

1906年,普里什文认识了民俗学家翁楚科夫(Н. Е. Ончуков),并很偶然地在他那里获得了一个前往俄国北方考察的机会,此次北方之行的重要收获就是他的成名作《鸟儿不惊的地方》(В краю непуганных птиц, 1907)。这部将民俗考察报告和诗意散文融为一体的作品轰动了彼得堡,受到许多著名作家和学者的好评。次年,普里什文再接再厉,又一次前往北方,并写成了《跟随魔力面包》(За волшебным колобком, 1908),作品同样获得了成功,作家和批评家们对它的肯定甚至还超过了《鸟儿不惊的地方》,因为他们在普里什文的这部新作中品味出了更多的文学性和诗意。普里什文从此扬名俄国文坛,并被视为俄国北方自然和民间文化的发现者和再现者。

1908年,普里什文第三次出门,此次的目的地是扎沃尔日耶地区(Заволжье),即伏尔加河、乌拉尔山脉和里海沿岸之间的地区。这里和俄国北方一样,也是俄国分裂教派的一个传统聚居地,而传说中沉没的古代城市基

捷什(Китеж)^①,更是普里什文潜心追寻的对象之一。一年之后,普里什文推出了他的第三本书《在无形之城的城墙下》(У стен града невидимого)。普里什文的这个选题,与当时弥漫在俄国知识界的“寻神论”思潮密切相关,与他对分裂教派由来已久的兴趣也不无关系。写作此书时的普里什文,与俄国著名作家列米佐夫(Алексей Ремизов)往来密切,列米佐夫对生活所持的神秘主义态度,对民间古风旧俗的热衷,对古代俄语语汇的偏爱,都对普里什文很有影响,也正是列米佐夫把普里什文引入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主持的宗教哲学学会。而对俄罗斯民族神秘的民间信仰和深刻的宗教性的探求,构成了普里什文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内容。在《在无形之城的城墙下》中,普里什文对普通人的宗教生活以及信仰的缺失给俄罗斯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予以了关注,他惊讶地发现,主张“新宗教意识”的都市知识分子和偏僻地区不识字的旧礼仪教徒,居然在不约而同地进行着性质相近的精神探索。

三次旅行留下了三部很有影响的作品,普里什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终生都在旅行,也终生都在写作,而他的写作基本上都是在旅行期间完成的。1909年,他在中亚地区旅行了两个月,到过额尔齐斯河流域,此行的收获是系列抒情小品《黑皮肤的阿拉伯人》(Черный Араб, 1910)和基调相对沉重的特写集《亚当和夏娃》(Адам и Эва, 1910)。《黑皮肤的阿拉伯人》所记叙的是普里什文在亚洲中西部地区的旅行见闻,“亚洲”是普里什文心目中的理想国,他后来多次将少年时的那次出走称为“逃向亚洲”,但现实中的亚洲和他心目中的和谐国度还是有差距的,普里什文的失望和由之而生的思索也渗透进了作品的字里行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篇幅不大、内容也不算新奇的作品,却被有的论者视为普里什文创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正是在这部作品中,普里什文作为一位艺术家的写作手法最终形成了,普里什文也藉此谋得了自己独立的艺术风格,在象征派和高尔基之间建立起了一座“独门宅院”(особняк)^②。而在此前,无论在美学观念还是精神追求方面,他都曾很接近以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代表的象征派,而高尔基创作中那种乐观的、肯定现实的态度也对普里什文很有诱惑,他们两人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高尔基不仅多次对普里什文的作品给予盛赞,而且还在他主持的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普里什文的第一部文集(三卷集,1913年)。但是,从《黑皮肤的阿拉伯人》开始,

① 这是传说中的一座俄国圣城,据说为了在鞑靼人入侵时保全此城,上帝让它沉向光明湖(Светлое озеро)的湖底。

② Н. 斯卡托夫主编:《20世纪俄国作家辞典》,俄文版,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卷,226页。

普里什文还是开始走自己独特的路了。《亚当和夏娃》在主题上与《在无形之城的城墙下》和《黑皮肤的阿拉伯人》有相通之处,也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和现实性,它将民众的迁居当作一个社会和道德问题来思考,民众对幸福乐土的不懈追寻让作者激动不已。

1911年是普里什文创作中十分重要的一年,因为正是在这一年,本文开头处提到的那位著名评论家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发表了他那篇重要论文——《伟大的牧神》,将普里什文视为一个具有宇宙感觉的大艺术家,一个真诚面对大自然的诗人。从此,普里什文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十分稳固了,关于他的评论也渐渐多了起来,尽管这些评论是各各不同的,比如,大多数论者都认为普里什文对人和自然都充满着细腻的爱意,可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夫人吉比乌斯(Зинаида Гиппиус)却认为,普里什文自始至终都只是个民族学家,“缺乏人性”,“用眼睛代替了心灵”。后者的评论让普里什文耿耿于怀,他到晚年还不止一次地在日记中提起吉比乌斯的这个观念,并为自己辩护。但无论如何,普里什文在20世纪最初10年过后已经成了一位文坛名人,他也经常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那些文章后来经过选编,构成了《陈旧的故事》(Старые рассказы, 1910—1912)和《五花八门集》(Заворощка, 1913)两部文集。

然而,在引起了批评界的这次集中关注之后,普里什文的创作反而出现了某种低潮,从此时起直到20年代,他都没有推出什么有广泛影响的大作品。究其原因,恐怕有这样几个:一、普里什文的母亲于1914年去世,她把自己含辛茹苦赎回的赫鲁晓沃庄园作为遗产留给了普里什文,普里什文回到故乡,在庄园大兴土木,这耗费了他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里什文曾作为战地记者走上前线,为报纸写了很多政论文章,在整个战争期间他自然无法潜下心来写作。三、十月革命后他一度成为“革命的对象”,1918年1月,由于对革命中的血腥暴力有所抱怨和指责,他曾被“契卡”逮捕,同年春天,他在自家的庄园赫鲁晓沃被“土改”的农民扫地出门,流离失所,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携家眷四处流浪,干过很多杂活。1920年,普里什文来到妻子的故乡斯摩棱斯克省多罗戈布日县,但同样不被农民接受,有一段时间被迫在森林边的草棚里安身,靠自己打猎和亲戚们的接济勉强度日。后来,在担任了中学老师之后,生活状况才有所改善。

1922年,普里什文一家来到莫斯科郊区,他又重新开始杂志上发表作品。在此前后,他曾把自己的自传体中篇《猴子的奴隶》(Раб обезьяний, 1920,后更名为《尘世苦难》(Мирская чаша),1982年全文发表)直接寄给托



洛茨基审查,结果是自讨苦吃,托洛茨基在肯定该书“很有艺术长处”的同时,称其是“彻头彻尾反革命的”。好在普里什文为人比较低调,其作品的主题也不太重大,因而才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追究。几年之后,随着《小圆面包》^①、《黑皮肤的阿拉伯人》等作品的重版,普里什文才又重新被文坛所注目,但也只被视为一位“同路人作家”。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有些“落伍”,普里什文也试图为融入新生活而作一番努力,反映莫斯科郊区皮鞋匠人生活的《皮鞋》(Башмаки, 1925)一书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但是,普里什文迅速地意识到,描写新的现实和现实中的巨变,歌颂新人及其劳动,这些都不是他的长项,他不久就返回了对自然的关注和描摹。1926年,他的《别连捷伊泉水》(Родники Берендея)一书部分发表,此书是在日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普里什文终生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他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自然和自然现象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随之产生的睿智而又深刻的哲理思考。由《别连捷伊泉水》开始的这种短小精悍、格言警句式的系列特写形式,从此成了普里什文最主要的创作体裁之一,也成了俄国文学中所谓“普里什文风格”的重要标识。“别连捷伊”原系11—12世纪俄国南部一个突厥游牧民族的称谓,在普里什文这里,这个称谓又被赋予了多重含义:首先,是自然王国的主人;其次,是森林和沼泽地带的居民;再次,是那些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人;最后,是关于自己理想身份的一种称呼,他曾将自己的妻子称为“别连捷耶娃”。正是在“别连捷伊王国”的流连忘返,使普里什文的创作发生了一个变化。1953年,以《别连捷伊泉水》为基础加工、扩充而成的《大自然的日历》(Календарь природы)一书出版,普里什文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归纳了自己的创作转折:“我开始尝试进行新的旅行,但这新的旅行与其说是朝向远方,不如说是朝向深处,——我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身边那些让我感到亲近的日常的东西。我写出了《大自然的日历》之后就一直这样写了下来: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方法。”^②《大自然的日历》是“在春天的口授下完成的笔记”,作者严格按照大自然四季转换的时间顺序来写,从春天的第一滴水写起,一直写到第二个春天的萌动,在这里,他第一次将“大地本身”当成了作品惟一的主人公。

1926年,普里什文迁居到离莫斯科不远的谢尔吉耶夫镇(Сергиев посад, 1930—1992年间更名为“扎戈尔斯克”(Зарорск)),在此一住就是10余

① 即《跟随魔力面包》,这部作品曾以《小圆面包》为题出过单行本。

② 普里什文:《光的春天》,俄文版,莫斯科,1953年,325页。

年。谢尔吉耶夫镇是俄国最著名修道院之一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所在地,即便是在革命势头最猛的20—30年代,这里依然有着比较浓厚的宗教氛围。在这里,普里什文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恶老头的锁链》(Кащеева цепь)。

三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普里什文已经成为一位公认的大师(国家文学出版社接连出版了他的两部文集:1927—1930,七卷集;1929—1930,六卷集),因为他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细腻、准确的随笔基础上形成的哲理抒情散文风格。从这一时期起,他将自己的所有作品都称作随笔,无论是散文诗小品,还是长篇小说的片断。但就在这个时候,苏联报刊上却出现了一些抨击普里什文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是一些持有庸俗社会学观点的“拉普”阵营人士,他们指责普里什文“不相信革命的终极目的”,将他的创作贬低为“生物主义”和“阿尔帕托夫气质”(алпатовщина,阿尔帕托夫是《恶老头的锁链》中的主人公),认为作家“不善于或者是不情愿服务于阶级斗争的任务和革命的任务”(1;27)。这样的“评论”让普里什文深受刺激,他甚至在日记中流露过自杀的念头。随着“拉普”的垮台,普里什文的处境才渐渐宽松起来,但大多数人只视他为一位生活特写、狩猎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家,最高的评价也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歌手”。不久,随着小说《人参》(Жень-шень, 1933)的发表,普里什文彻底改变了那些人对自己的看法;而30年代末《灰猫头鹰》(Серая Сова, 1938)等一系列作品的发表,则使普里什文被公认为苏联文学中最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

1937年,普里什文从谢尔吉耶夫镇迁居莫斯科,30年代末,面对腥风血雨的社会现实,普里什文的内心发生了一场精神转变,开始接近基督教的博爱理想。1940年,年近7旬的普里什文与列别捷娃(В. Д. Лебедева)成婚,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列别捷娃对晚年的普里什文产生了影响,同时,作为一名很有文学修养的女性,她也为宣传普里什文的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在她的文字的影响下,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普里什文不仅仅是一位“大自然的歌手”,而且更是一位具有宇宙意识的思想家。由他俩合作、于199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我们俩》(Мы с тобой)一书,对他们相知相爱、相互理解和阅读的过程做了很好的描述。普里什文去世之后,В. Д. 普里什文娜潜心总结普里什文的文学遗产,宣传普里什文的创作和思想,亲自为多种版本的普里什文文



普里什文文集

集或选集作序,并将普里什文的日记和其他遗稿整理出版。她写作的《我们的家》(Наш дом, 1980)、《生活的圈子》(Круг жизни, 1981)、《通向词语的道路》(Путь к слову, 1984)等书,以及前文提到的她与普里什文合作的《我们俩》,不仅是关于他俩共同生活的有趣记述,也是对晚年普里什文生活和创作的最好诠释,已成为普里什文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必读的书目。

1940年发表的《赤裸的春天》(Неодетая весна),同样是在日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在这本书中,普里什文试图“反映包括动物和植物在内的、与我们血肉相连的大自然,将它当作人类伟大的家”。卫国战争期间,普里什文拒绝疏散至高加索,而是去了雅罗斯拉夫尔的林中小村乌索里耶(Усолье),那里曾是他打猎常去的地方。战争期间,普里什文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包括《叶芹草》(Фацелия)在内的《林中水滴》(Лесная капель)。直到1943年,作家才返回莫斯科,他以在卫国战争期间的经历和感受为基础,创作出了反映卫国战争的两部小说:《列宁格勒孩子们的故事》(Рассказы 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х детях)和《我们时代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前者写列宁格勒围困期间幸存下来的孩子,后者写俄国妇女在战争期间的命运。1943年,普里什文在70周岁生日时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

战争结束后不久,普里什文在莫斯科郊外的杜尼诺村(Дунино)得到一幢不大的房子,房子坐落在莫斯科河畔,普里什文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1946—1954)。普里什文非常喜欢杜尼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仿佛又回到了赫鲁晓沃,回到了世上最美好的一块地方!”(1;32)

战后,普里什文主要是以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活跃在苏联文坛上的。1945年发表的《太阳的宝库》(Кладовая солнца),可能是普里什文儿童文学作品中知名度最高的一部,但长期以来,人们大都认为它是一部描写儿童性格形成过程的作品,而对其中所包含的人与自然的主题关注不够。1954年,就在普里什文去世的那一年,《太阳的宝库》的姐妹篇《船木松林》(Корабельная чаша)出版,两部作品有着共同的主人公,也有着共同的主题。《船木松林》就情节而言是《太阳的宝库》的延续,其内在的含义就是对真理的寻求,而蕴藏着真理的民间,其象征就是北方老人们常常提到的神话般的“船木松林”。普里什文首次将这两部中篇称为“童话”(сказка),从此,普里什文又转而将自己的作品都称作“童话”。

在普里什文创作中的“杜尼诺时期”,作家一直在写作长篇小说《国家大道》(Осударева дорога)。这是普里什文最后一部大型作品,也是普里什文最用心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国家大道》的主题最早出现在《尘世苦难》中,即

个性与社会的矛盾,苦难及其意义,这一主题与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有些相近。小说所描写的“国家大道”,就位于普里什文第一次北方之行所考察过的地区,它是彼得一世当年为了开辟北疆、与瑞典争霸而修建的,供运输战船之用。1933年,前往正在修建中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地体验生活的普里什文,重游了奥涅加湖区,热火朝天的运河工地与彼得的古代大道在他的脑海中渐渐重叠起来,这促使他对历史与现实、自然的存在与人的创造、民众的付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样的命题也许是过于复杂了,也许是与那个时代太不合拍了,这使得《国家大道》的写作非常艰难,其创作时间持续了近20年,而且最终仍未完成,这在普里什文的创作中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现象。普里什文曾在日记中写道:“大地就是必然性,意志就是对必然性的意识(牺牲)。这是自由人的想法。而奴隶却认为:大地就是自由,意志就是剥夺。”(1;34)联系到普里什文写作《国家大道》时的时代背景(40年代中期),就能对他的历史思考的现实指向有所体悟。普里什文称这个长篇为“童话历史”(сказка—быль),联系到一句俄国谚语:“童话是编的,歌却是历史。”(Сказка складка, а песня быль.)普里什文的这个体裁命名就更为值得回味了。也就是说,他的“童话”是真实的,是取自真实生活的,他似乎是在有意强调其“童话”的现实指向。

在写作《国家大道》的同时,普里什文对自己的大量日记进行加工,整理出了《大地的眼睛》(Глаза земли, 1954)一书,但是普里什文没有看到这本书的面世。1954年1月16日,普里什文在莫斯科逝世,终年81岁。普里什文30多岁才发表自己真正有影响的作品,这在天才成群的俄国作家中算是大器晚成的了;而他一直不懈地写作到80余岁,在俄国作家中又算是一个不多见的长寿者。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普里什文写道:“我将自己生命的前半段,即30岁之前,用在了对文化元素的外在把握上,或是用我如今的话来说,就是用在了对他人智慧的把握上。在我生命的后半段,从我拿起笔来写作的那个时刻开始,我就步入了与他人智慧的斗争,其目的就是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把他人的智慧转化为自己的财富。”(1;5)在“他人的智慧”(чужой ум)和“自己的财富”(личное достояние)之间,普里什文找到了一个过渡,但我们觉得,对于普里什文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创作和自然之间发现了一种契合。

普里什文去世以后,他在杜尼诺的故居被辟为博物馆。他的姓氏不仅留在了俄罗斯文学中,还与俄罗斯的山水永久地联系在了一起,“苏联高加索有一座山峰、有一片湖水,远东千岛列岛有一个岛屿——以他的姓名命名”。^①

四

在普里什文的创作中,由普里什文本人所提出的两个命题占据着核心的位置,这两个概念就是:“亲人般的关注”和“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

所谓“亲人般的关注”(родственное внимание,又译“亲情关注”),是普里什文自己提出的一种面对自然的态度,他在自己的文章和日记中多次提到这个概念,并常常用斜体着重标出。普里什文自己对“亲人般的关注”的解释也有多种,如“对素材的十分亲近的态度”(《我的随笔》),或“爱的关注”^②,或“一种行为方式”(7;265)。无论是“亲近的态度”还是“爱的关注”,无论是“心灵的状态”还是“行为方式”,其实都是“外在的”探究和“内在的”直觉相互统一的认知行为(1;14),就像一位俄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心灵和反映对象的融合”^③。

在我们看来,普里什文所说的“亲人般的关注”,大致应该包含这么三层意义:

首先,是作家对自然满怀深情。普里什文具有丰富的生物学知识,他认识那么多的树木花草,飞禽走兽,能够轻而易举地道出它们的名称和习性,他熟悉自然界的一切,对每一件物什都如数家珍,信手拈来,甚至表现出了马克·斯洛尼姆^④所说的那种“自然主义者的精确性”^⑤。然而,这种“自然主义者的精确性”却赋予了普里什文一种常人所没有的“特权”,即在自然界中的亲切感,大自然就像是他温暖的家,自然界中的万物就像是他的亲人。普里什文在30年代末的《林中小溪》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无论早晚,我的小溪终将抵达海洋。”(1;7)这里的“小溪”是对他的创作的一种比喻,同时也确指自然界中的

① 叶水夫主编:《苏联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卷,43页,文字作者为乌兰汗。

② B. 普里什文娜:《普里什文论托尔斯泰》,载苏联《十月》杂志1958年第8期,171页。转引自杨怀玉:《论普里什文“自然与人”的创作思想》,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43页。

③ H. 斯卡托夫主编:《20世纪俄国作家辞典》,俄文版,第2卷,225页。

④ 马克·斯洛尼姆(Mark Slonim,1884—1976),美国著名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其著作《苏维埃俄罗斯文学》(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Writers and Problems. 1917—1977)一书在中国流传很广,但不知何故,他的姓氏却一直被误译为“斯洛宁”。

⑤ 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浦立民、刘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12页。

溪流。普里什文就是这样,可以在自然界任何一个生物、任何一个现象之前冠以物主代词“我的”。带着这种亲情,普里什文能品味出动物身上的人性和人情味,在《鸟儿不惊的地方》中他写道:被散养的牲畜,整个夏天都没有疏远人们,“而山羊甚至怀恋起尘世生活,只要看到湖中驶过的船只,它们就在水边挤成一团,怅惘地‘咩咩’叫个不停”。(2;68)为了观察一只鸟,他有时竟匍匐前进,甚至一连爬上一二里地,他认为这才是猎人的最高享受。(1;189)在森林中潜伏、匍匐的时候,他感觉到:“我就是一头野兽,我具有野兽的一切行为方式。”(1;257)他看着大海,觉得海面下一定是一片翠绿的水下森林,他“就想沉下去,听鱼儿在枝头窃窃私语”。(1;220)在《大地的眼睛》中的《我母亲的梦》一节里,普里什文这样抒写了他对自然的深情:

夏天里所有的鸟儿都在歌唱,四周散发着清新的气息。我仿佛觉得,整个自然都在安睡,就像我亲爱的母亲,而我却醒来了,我静悄悄地走着,生怕惊醒她。

但自然却在安睡,和亲爱的母亲做着同样的梦。她睡着,和亲爱的母亲一样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关照我。我砰地一声关上车门,跳过壕沟,此刻正默不作声地坐着,而她却不安起来,——他哪儿去了?他出了什么事?

我赶忙咳嗽了一声,她这才放下心来:他在某个地方坐着呢,也许在吃东西,也许在幻想着什么。

“睡吧,睡吧,”我轻声地回答,“你别担心了!”(7;124)

自然就像是自己亲爱的母亲,离去的母亲化作了自然,自然像母亲一样关爱着“我”,“我”也像眷恋着母亲一样眷恋着自然,——普里什文与自然的这番心理对话和感情交流让我们感动不已,一位作家对自然的温情和深情,大约也莫过于此了。

其次,“亲人般的关注”强调的是一种与自然“共同创作”(сотворчество)的方式。在普里什文看来,大自然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不仅动物和植物有生命,甚至连自然中的每一个存在和每一个现象都是有生命的。普里什文认为,具有思考能力的不仅有人,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物,甚至连沼泽也在“按自己的方式思考”,甚至连沼泽里的小鸟姬鹀,“大小如麻雀,喙却很长,在它那若有所思的黑眼睛中,也含有所有沼泽都想回忆点什么的永恒、枉然的一致企图”。(1;13)在大自然中,普里什文“学会了去理解每一朵小花在谈到自己时的那种动人的简朴:每一朵小花都是一轮小太阳,都在叙述阳光和大地相会的历史”。(4;13)甚至连海边的一块心脏形状的礁石,也能让普里什文感觉出

它的“心跳”：

紧靠海边有一块黑色的礁石，它就像一颗黑色的心脏。或许，是一场最猛烈的台风什么时候把它吹下了悬崖，又把它不稳当地放在了水边的另一块岩礁上；这块形状像心脏的礁石，如果你俯卧在它上面，胸口紧贴着它，握住呼吸，似乎就能感觉到它在随着波涛微微地摇晃。但是我的确不知道，这是否可能。也许，不是大海和礁石在动，而是我自己在因为自己的心跳而摇晃。我孤身一人，感到很不好受，想有个人做伴，于是就把这块礁石当成一个人，像与人相处一样地与它相伴。（《人参》，4；19）

一股盲目的力量带着强烈的痛苦和忧伤把我赶出家门。我徘徊于林中和山间，最后不免又来到这块礁石旁。礁石上那无数的缝隙就像是泪囊，不断有水从中渗出，逐渐聚成大颗大颗的水珠，似乎——这块礁石在永恒地哭泣。这不是人，而是一块礁石，我清楚地知道，礁石是没有感觉的，可是我却与它心心相通，我分明听见了它的心跳声，于是我又回忆起了往事，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青春时代。（《人参》，4；77—78）

这不是简单的拟人手法，而是一种感同身受。对自然，对大自然中的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每一件东西、每一个现象和每一个瞬间，普里什文都充满着深深的温情。而且，他的这一情感还不像当今一些环保人士、自然之友、绿党成员和动物保护主义者等等那样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呵护，一种具有使命感的赐予，而是永远以一种平等的态度看待自然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遵从自然的“口授”，根据四季的更替来安排自己的作品结构，他才能时时处处感受到“大自然的智慧”，从自然中领悟出生活的真谛。这能让我们联想到我国北宋的周敦颐，他“窗前草不除”，因为那草也“与自家意思一般”。自然就是普里什文硕大的书房，自然就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另一方面，自然本身也存在着巨大的创作潜力，小到一朵小花的花开花落，大到宇宙的形成演变，都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创造过程。将自然万物都看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创造过程，普里什文因此才对自然持有“亲人般的关注”，因此才希望通过自己的感悟和写作使“人的创作”和“自然的创作”相互呼应，让这两种创作相互结合起来。

如同自然的周而复始一样，普里什文也常常返回同样的题材，甚至连一些书名、标题或命题都一再反复使用，如“鸟儿（鸟兽）不惊的地方”、“一年四季”、“光的春天”……然而，这一个个重复出现的生物、季节或场景，在普里什文笔下却又每每不同，在普里什文看来，每一个清晨、每一片新叶、每一只蚂